

政 治 体 系

——政治学状况研究

〔美〕戴维·伊斯顿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政 治 体 系

——政治学状况研究

〔美〕戴维·伊斯顿 著

马清槐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3年·北京

David Easton
THE POLITICAL SYSTEM
AN INQUIRY INTO THE STA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lfred A. Knopf, Inc.
New York 1953

ZHENGZHITIXI
政治体系
——政治学状况研究
〔美〕戴维·伊斯顿 著
马清槐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278-3/D·106

1993 年 5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230 千
印数 0—2700 册	印张 9 3/4

定价：6.50 元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1917年生于加拿大多伦多,1943年移居美国后成为美国公民。1947年,他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之后,长期在芝加哥大学任政治学教授。此外,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1968—1969年)、美国文理学院研究与规划委员会主席(1979—1982年),以及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研究员。他是政治系统论的创始人和美国政治学界后行为主义运动的倡导人之一,是美国研究政治行为理论的著名学者,1983年曾来我国讲学。其主要著作除本书外,还有《政治分析的框架》(1965年)、《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1965年),等。

本书是一部以美国政治学的状况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如何建立政治学理论体系的专著。其目的在于引起人们重视研究政治学理论的必要性,并使政治理论确立在社会科学中应有的位置。作者对美国政治学的状况、如何进行政治理论研究、政治学的任务和目的,以及政治理论同道德观念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都有独到的看法。因此,本书问世后,深受美国政治学界的重视。

本书在论述美国政治学发展的历史时认为,19世纪最后25年至本世纪50年代初,美国的政治学落后于其他社会科学,对主要社会集团之间的权力分配状况只能提供有限的知识;对各社会集团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方面怎样互相影响,也缺乏研究。原因在于研究者局限于研究特定的条件,乃至忽视政治上的变化,认为现行政治体系虽有缺点,但是可以接受的世界最佳的政治体系。另一方面的原因是过分忽视一般的理论,虽然也存在没有认真注意

调查研究方法问题,但是与缺乏明确的理论相比,方法问题是次要的。所以这个时期美国政治学面临的问题是,只有澄清了研究中的主要理论前提,才有可能用科学的方法了解政治生活。

作者在本书中提出,政治学要在分析和概念方面有所成就,有了一些基本的或主要的概念,才能逐步形成系统的理论。这里所说的概念,是用一种高度抽象的概念来取代传统的、只说明个别政治现象的概念。因此,发展系统理论首先要深入探讨以调查研究为基础的“定向概念”,即指明方向的概念。政治生活关系到形形色色的活动,这些活动会影响为一个社会而采取的权威性政策以及付诸实施的方式。当人们以某种方式涉及为一个社会制定和执行一种政策时,就是参与政治生活。政治学的任务就是了解社会政策应当是什么,那种政策应当如何制定出来并付诸实施。本书着重指出,为一个社会制定权威性政策的概念当中,有一组为政治研究指明方向的概念,就是政策、权威和社会。

政策的实质是什么?本书认为,一项政策的实质在于不让一部分人享有某些东西,而允许另一部分人占有它们。换句话说,不论是为了一个社会,还是为了一个范围狭小的社团,或者为了任何其它集团,一项政策包含着一系列分配价值的决定和行动。概括地说,政策就是根据法律“分配权利和特权的行径”。作出一项决定,就是制定一项政策的“正规阶段”,在采取行动贯彻这项决定时,就进入“有效阶段”。政治学所以以政策为研究方向,原因就在于此。但是政治学研究只涉及各种权威性分配方法或政策,它力求了解各种价值如何被权威性地分配给整个社会,更不是分配给社会内部某一集团的方式。只要有一个社会存在,总会有一种分配价值的方式,这种分配方式,对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或大部分成员是带有权威性的。当人们普遍感觉到他们必须或者应该服从一项政策时,这项政策就具有权威性。为了权威性地解决人们在社会中想

望获得的份额，对某些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是不可避免的。依靠权威为社会分配价值的行为，是在一个可以分辨的过程中进行的。

如何理解权威和权力的关系，本书认为权力是表示关系的现象，不是某一个人占有的一件东西，它依靠的是影响别人行动的能力，但是并非任何影响都应当作权力。政治学对权力的关注，只是从它致力于研究政策如何制定和执行中引伸出来的。政治学是研究受权力分配和运用的影响下的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的，这是作者在本书中最突出的观点。

本书作者还提出，政治研究工作向来不可能摆脱它同道德价值观点的牵连。一位政治理论家传达其价值观念的方法，不在于说明若干教条式的前提，而在于他认真解释他的道德观点对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的影响。系统理论的发展，通常与那位理论家的道德观点有关，了解他这种观点，有助于了解他提出的理论。

本书作者在阐述自己关于政治学研究的观点的同时，对近现代一些政治学名著和著名政治学家的学术思想进行了分析、评论。本书写于 50 年代初，其后美国政治学无疑有了许多新发展。但本书的立论和对其他政治学家的评论，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西方政治学，仍有其参考价值。至于如何看待书中的观点，读者自有自己的看法，这里无须赘述。

1991 年 4 月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基调和方法	3
一 醉心于理性	7
二 遭受挫折的希望	15
三 逃离理性	19
四 自行实现的无私预言	24
五 受文化制约的科学	31
第二章 美国政治学的状况.....	36
一 政治学出现的毛病	36
二 资料来源	46
三 理论的作用	51
第三章 在凭经验进行的研究工作中关于 科学和理论的概念	62
一 超求实精神	64
二 一门不成熟的政策学	75
第四章 政治研究工作的方向	86
一 正确判断种种概念的必要性	88
二 关于一个政治体系的想法	92
三 社会科学的分门别类	95
四 国家观	101
五 关于权力的概念	109
第五章 政治研究工作的适宜指针	119
一 关于政治生活的常识观念.....	120

二	对一个社会进行的权威性价值分配·····	122
三	社会中需要进行权威性分配·····	128
四	确定政策活动方向的重大意义·····	135
五	这种方向选择的正确性·····	139
第六章	由环境产生的资料·····	142
一	理论和种种类型的资料·····	142
二	形势的经过规定的或合法的方面·····	145
三	结构中的活动·····	152
第七章	形势的全盘结构·····	163
一	集团构成部分·····	163
二	集团和形势·····	167
三	形势中社会群体的种种类型: 社会集团·····	172
四	政治形势中社会群体的类型: 社会分组人群·····	176
五	形势的结构·····	181
第八章	行为资料·····	189
一	政治行为研究·····	190
二	形势资料的隐蔽状态·····	194
第九章	理论研究的伦理基础·····	206
一	一项道德价值判断的若干特征·····	207
二	不提价值观念进行政治研究的可能性·····	209
三	澄清道德观念的意义·····	214
第十章	现代政治理论的衰落·····	219
一	衰落成历史主义·····	220
二	邓宁的历史主义·····	223
三	麦基尔韦恩的历史主义·····	226
四	萨宾的历史主义·····	234
五	衰落的根源·····	239
第十一章	对一种概括性政治理论的批判·····	250
一	一般均衡论的意义何在·····	252

二	作为描述性结论的一般均衡论·····	257
三	作为理论的一般均衡论·····	266
四	宪制均势·····	274
第十二章	政治理论的恢复活力 ·····	287
一	政治理论的任务·····	289
二	理论研究工作的自律性·····	293
三	结论·····	296

序 言

这篇论文涉及今天美国众所周知的政治学的状况，以及一般政治理论在道德上和因果上同它的关系。在较早的几个世纪，一个研究政治体系的人本来很难把他的理论探讨同他的一般政治研究区别开来。然而，在今天的美国，人们已经越来越难以理解为什么政治理论要继续被算作政治学的一个中心部分。理论已经越来越远离政治研究的主流。如果这篇论文稍稍有助于为政治理论恢复其固有的无可争辩的地位，那它就会起到有益的作用了。

在撰写这本著作时，我特别承蒙两位同事的热情帮助：感谢赫尔曼·芬纳教授，因为他坚持认为，我对理论的初步重新考察可能会引起更广泛的读者的兴趣，并慨然允许这篇论文的好几部分参考其精深的政治见解；感谢伦纳德·D.怀特教授，由于他渊博的知识和源源不断的鼓励，我的手稿才在形式和内容上得益匪浅。还有其他一些人非常慷慨地向我提供了时间、精力和意见：C.赫尔曼·普里切特和爱德华·C.班菲尔德两位教授阅读了大部分的手稿；利奥·斯特劳斯的善意批评和使人产生兴趣的学术成就，使第九和第十章受益颇多；第十一章经过了朱利叶斯·马戈利斯教授的严格审读，并且我希望该章能在某种程度上稍稍反映出我与西奥多·摩根和肯尼思J.阿罗两教授就其总的论题进行的多次讨论；手稿有幸问世得力于小V.O.基教授眼光敏锐的、明智的编辑工作。这篇论文的定型在许多精细的方面还有赖于我妻子的努力，因为她充实了它的内容，帮助阐明了它的结构和意义，并编纂了以后的几个版本。不必说，除了我的妻子以外，我不敢在所

提出的见解方面让其他任何人负责。

本书的若干部分在没有注明出处的情况下借用和改写了我以前发表的这样两篇文章：“哈罗德·拉斯韦尔：为一个民主社会制订政策的学者”和“近代政治理论的衰落”。这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1950和1951年的《政治学杂志》上。第六、七、八章曾以节略的形式发表在《国际社会科学学报》(1952年)第4期，第107—123页上。我感谢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部的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因为它提供了经费，资助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支付的誊抄费用。在帮助准备手稿以便出版的许多杂务方面，我还希望向约翰·格林夫人、T. 楚博士、R. 西格里亚诺先生和E. 里佐先生致谢。

戴维·伊斯顿

第一章 基调和方法

我的理论历来是这样：如果我们的心里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那么，人们关于大有希望的恭维话就同表示悲观失望的哀叹一样不花什么本钱，但比那种哀叹较为悦耳。

托马斯·杰斐逊^①

自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起，政治学就一向以主要的学科著称。虽然今天的政治学家如果把他们的网撒得太广，就可能被指责为野心太大或怀有帝国主义倾向，但他们的论题对于解决我们目前的社会危机来说还是不可忽视的。所以，如今他们很可以不必那么谦虚，不妨承认他们相信自己在一切社会科学方面为人类的命运而进行的研究工作的卓越价值。然而，根据社会对他们的种种要求以及政治学事实上所能达到的成就来看，他们将不得不同样真诚地收敛一切骄傲，承认美国政治学在取得研究成果方面遇到严重的困难，不容易满足它所承担的任务的要求。

可以提出许多无法反驳的理由来说明一种已有二千五百年历史的训练方法何以产生令人失望的结果。这篇论文的重点是，我们必须把经常不愿研究美国政治学的心理列为那些理由之一并放在显著的地位，来认真地采纳和传授关于正确的思考、观察和描述

^① 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有影响的政治哲学家。——译者

的标准，而我们今天却往往把这些活动同一种被不正确地称为科学方法的研究态度联系起来。如果接受这种方法并用于不断地研究基本的原理和假设，那就会暴露出这样的情况：政治学的许多缺点的一个主要根源在于不能阐明事实与政治理论之间的真正关系，以及理论在这种合作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一切成熟的科学知识是理论上的。这显然并不是说种种事实都不重要。在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目前以高度经验为基础的阶段，没有必要坚决主张科学知识必须在事实方面有充分的根据。然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种种事实本身并不自动地使我们能够解释或了解一件大事。我们必须用某种方法把一些事实理清，才能看出它们的关系。在理清这样一些事实并弄清它们的关系上，概括的水平愈高，解释和了解的范围也就愈广。一套整理各种被我们称之为政治事实的概括，显然会比仅涉及两个这样的事实的一概括更有助于了解政治活动。为此，在以后要讨论的其他问题中，探求关于以经济为依据的政治现象的可靠知识这项工作就最后要求创立系统的理论，即概括论证的最高形式。

很明显，如果政治学能够得出这样一种综合的理论，它会给予我们的对政治生活的了解将必然是既深刻而又广泛的。因此，我们毋需指出，这样的理论必将由于它的效用而受人欢迎。然而，唯一并不明显的是，系统地阐述这样的理论，是否为探求关于政治学的有理解力的可靠知识方面可能采取的必要步骤。

在今天美国进行政治研究的范围内，还看不出有这样的理论；我也不愿冒昧地说我想在这本书里提出这种理论。一种理论的确实出现的点滴迹象，在这里主要是偶然遇到的。何况我的目的是要提出，政治学不太敏感，难以根据需要探究政治活动的这种全面或总的理论在其发展道路上所存在的问题。我将强调说明，美国政治学没有注意去辨明那种理论在获取可靠知识方面所起的作用

这一点，已经有助于危害其想要了解政治生活的一些主要问题的企图。我将证明，如果不能有意识地了解理论及其可能性所起的作用，政治研究就一定仍然是驳杂的和支离破碎的，不能履行其作为一种政治学所作出的诺言。按照这种解释，我将非探究一些可能会出现重大问题不可，如果美国政治学要利用它的一部分智力去研究概括的或系统的理论的话。

今天我们面临着希望日益渺茫的局面，不能再指望全盘科学论证作为帮助我们了解社会问题的手段了，要不是存在着这样的事实，我们是可以立即着手讨论我们的中心论题的。我们可以马上为美国政治学检查一些由于忽视系统理论而产生的重大后果，以及在创立这种理论的过程中所涉及的若干问题。然而，由于在此历史时刻反对科学方法的异议日趋强烈，如果希望人们容易接受那种认为政治学所需要的论证与其少些还不如多些的结论，那将即使不是天真，也至少是认识浅薄。因此，我由于目前对科学方法抱有怀疑，在这开头不得不力图探索这种心理状态的根源。

现在有一件奇怪的事实，那就是，美国政治学家即使作为一个集体，也十分强烈地表现出这种心理状态，他们大部分作为对政治生活进行科学研究的人员，已经自动地把心思放在模糊的形象上面。虽然有一些重要的例外，对此我将在以后的一章再来讨论，但研究政治学的大多数人已经至少表示出了一线希望，自认为是按照一种社会科学的最好含意来对它进行研究的。然而，尽管有这种自负，我们却从历史上发现美国政治学家中存在着一种显然不愿在其研究领域采用科学方法的严谨技巧和必要条件的倾向，而且他们更其不把科学探究的艰巨任务当作系统地阐述综合理论的任务。因此，我们在那些名义上承认自己既然担负科学家的任务就应当接受这种训练的成员中间发现这样一种特殊的状况，那就是实际上拒绝采用科学方法的公认的逻辑性和技巧。今天这种历

来不愿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知识的情况看来还没有什么减少的迹象；事实上，由于整个西方社会目前的基本思想状况，那种不愿采用科学方法的态度确实还在滋长。

政治学家中间关于科学方法能够帮助人们理解他们在政治处境中的行动怎样反映我们的时代精神这一点不断地抱有越来越多的疑问。本章的论点是，即使在其他社会训练中科学研究有明显的进展，为数不少的政治学家今天仍然不愿坚决主张在各自的领域中采用科学方法以探求普遍的概括论证，而这种情况却并非客观地评价这种方法是否有效的结果。它毋宁是他们受到西方文明中旨在反对利用科学推理的一种心情的支配的结果。我将要指出，不仅是政治学家，甚至那些社会科学家，纵然过去赞成应用这种推理来处理他们的问题，如今在这种心情的压力下，却认为一些未必有事实根据的约束性限制使他们不可能得到经过概括的知识。

这种逃避科学推理的行径，特别是在政治知识的范围内，从两个不同的方面表现出来：作为一种倾向，它在应用科学方法上无疑地存在着脱离对人生抱合理态度的现象，并趋向于更多地依靠感情或信仰，以及更多地依靠传统；同时它越来越愿意接受那些以当前的心理状态而不是逻辑推理为依据的论点，作为对科学方法的批判。但是，在考查关于对社会问题进行科学推理的方法是否合适这一点日益疑窦丛生的两种结果以前，我们必须简单地谈一下科学推理的方法在现代西方世界所起作用的著名历史。这种历史的回顾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目前正在对科学方法提出的一些批评意见的客观性。

一 醉心于理性

目前的时代,正如帕雷托、斯彭格勒和其他一些人所预言的那样,也许真是人们对理性的信念长期衰退的开端,或者它也许只是社会在不受损失并有所改善的情况下从中脱颖而出的一个短暂阶段。不管可能有怎样的结果,从目前历史上的有利地位来看,显而易见的是,从17世纪起到19世纪将近终了的时候,西方世界日益抱有一种信念,认为它能够实行科学方法所包含的那种推理工作,以解决涉及经验甚或道德的社会问题。

亚里士多德是西方第一位认真地处理各种事实的重要学者,在他以后的两千年期间,没有几位伟大的社会思想家致力于以经验为根据的研究。当他们最后确实感到有必要更仔细地研究人们的行为时,各种自然科学的方法就成了一种模式。当代的社会科学是为了响应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特别是牛顿的工作而开始产生的。牛顿在其三项运动定律中,概括和综合了较早时期的科学家的工作。从关于天体运动所了解的零零碎碎的情况中,他抽取了若干原理,从而以摘要的形式解释了一个显然缺乏有关资料的较大的物体。根据他那关于运动的少数基本原理,当时人们就有可能解释和预言许许多多的事实了。

牛顿体系的对称性、条理性 and 系统性,立刻给研究社会问题的学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成为社会调研人员力求达到的完美的典型。人们第一次在欧洲看出,也许自然科学的成就能够在社会领域得到再现,如果——这是重要的前提——社会研究采用自然科学的基本程序的话。当时的设想是,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至少是非常相似的,因此,可以应用于自然领域的基本方法也可经过适当的修改而转用于社会领域。当然,时至今日,这种设想已经并且正在受

到怀疑,但在当时却是一种被人广泛接受的设想和结论。

然而在实际应用上,研究社会问题的工作却由于人们对那种方法的性质产生了不可思议的误解而没有反映出物理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的人们看到了牛顿在探求其赖以创造综合方法的各种物理理论的工作中产生的成品,而没有看到投入那种探索的费力的、细致的劳动。牛顿的前辈曾经花费无数时日从事观察自然物体的活动,而他的运动定律就是总结了那些前辈的艰苦努力之后得出的成果。但由于惯常存在着对科学研究的曲解,研究社会的人们错误地认为牛顿确实是以他的种种设想开始其研究工作的,并象培根^①所比喻的蜘蛛那样,利用这些设想织出了一张复杂的结论之网。

由于人们对自然科学的研究程序抱有理解错误的想法,难怪霍布斯^②和斯宾诺莎^③这样一些人认为他们也是支持最好的科学传统的了。例如,当他们主要依靠以经验为基础的不定期观察逐步建立起精心论述的学说时,他们感觉到了这种传统的一部分,在那个时候,许多原理就是经过思索从那观察中得来的。他们主要是通过合理的思考,用这些原理详细阐明了关于政治生活的理论,在思考的时候还多少注意到种种事实,但并不迎合一种想要停留在那些事实上面的真正意图。这些思想家的值得称道的才华是,尽管他们的方法有些缺点,他们却主要能够深入了解政治学的性质,因此他们并不过分脱离自己所熟悉的现实。但是,他们所使用

① 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英国政治家和哲学家,著有《新大西岛》、《伟大的复兴》(未全部完成)和《论说文集》。——译者

② 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英国政治哲学家,他的名著《利维坦》包括“论人”、“论国家”、“论基督教国家”和“论黑暗王国”四个部分。他作为思想家,主要以对人的哲学作出贡献而驰名。——译者

③ 本尼迪克特·斯宾诺莎(1632—1677),生于荷兰,是17世纪的唯理性主义者,哲学史上最完善的形而上学体系之一的创建人。他的著名著作是《伦理学》。——译者